

漫忆文艺名人 倾听世纪回声

陈德璋
杨淑心
著

風雨秋思

中国文学出版社

漫忆文艺名人 倾听世纪回声

风雨秋思

杨淑心
陈德璋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秋思 /陈德璋,杨淑心编著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1

ISBN 7-5071-0386-2

I. 风… II. ①陈… ②杨…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4940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50 千 印数:1—3000 册

定价:13.80 元

序

傅 活



当街头书摊摆满以流行歌星照片作封面的书刊的时候,当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多是古今富商巨贾的生财之道的时候,我们向读者推荐这一本关于我国当代文艺大家足迹与心声的书——《风雨秋思》,是否有点不合时宜?

相信人们在兴趣盎然地读完这本书之后,正确的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一本内容真实丰富有趣的书,一本温故知新的书,一本陶冶情操的书,一本弘扬民族文化精华、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书,一本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有助益的书。

从本世纪初起始,或者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直到新中国诞生和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文艺界涌现了一批批具有高深思想理论水平或巨大艺术成就的文学理论家、作家和艺术家。本书写到的十六位,便是这样的巨匠或名

家。他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仍然健在，或带着某种伤残病痛而顽强地生活着和工作着。他们在或长或短的生命岁月中，不怕艰难险阻，执着地追求真理，挚爱文艺，勇于探索，善于创造，为祖国、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与建设事业，为中国的新文化事业乃至人类的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中有的成为中国文艺界威望很高的领导干部，有的则是某一文艺领域的佼佼者或代表人物。他们既是我国甚至世界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继承者，又是我国新文化的勇敢开拓者。他们也曾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他们的正确的思想理论、艺术成果、人生体验和为人风范，都是我国新文化的宝贵财富。因此，一切关于他们的经历、业绩与为人的照片和文章，都会为国内外的有识之士所欢迎和关注。

本书的两位作者，本着忠于历史、忠于现实的态度和保存史料、发扬传统的精神，用采访、特写或散文的形式，真实、细致、生动地介绍了十六位文艺家多姿多采的一生，或鲜为人知的生活片断，介绍了他们的业绩与为人，也介绍了他们在时代风雨中的困厄及其后的深切感悟，使我们不仅了解到许多关于新文艺的重要史料，而且获得了许多关于人生的启示。这两位作者在写作和出版这个集子上表现出来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令人钦佩的。

陈德璋和杨淑心伉俪是我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同届同学。我们曾在风光如画的珠江河畔康乐园里同窗五年，1964年毕业后又一起北上抵京工作。德璋先在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后调中国文联国际部工作。这期间，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茅盾、周扬、夏衍、阳翰笙等文艺界领导同志和一些著

名作家、艺术家,从而对他们的工作活动和言行,尤其是一些高龄人晚年的活动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其中有的可说独家第一手资料。他在繁忙工作和诗歌创作之余,也常常将这些见闻和感受撰文发表。这个集子中的部分文章即属于此。另有一些则是未发表过的新作。淑心先在北京文化局工作,后调中国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和记者,她在负责英、法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的“舞台与银幕”专栏时,结识、采访了很多文艺名家,并写成文章登在《中国文学》杂志上。她于1989年与德璋同时调到广东电视台后,也继续这方面的写作,迄今已在报刊上发表超过200万字的文章。她收入本书中的文章,有的是经过补充修改的旧作,有的则是新近写成。

他们的这些文章,与时下那些只经一两次短暂时间采访的急就章不同,它们是在与所写对象相处时间较长,彼此关系较密切,了解较深入之后才写成的。因为他们与所写人物或者是可经常见面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或者是在出访时、采访中建立了历久弥深的师生、朋友甚至是姐妹兄弟的情谊。所以,他们的文章写得翔实深刻,亲切自然,人物有血有肉。他们并不满足于写一些轶闻趣事,也不追求大而全,而是从读者关注的焦点落笔,抓住人物的特点去写,刻意写出人物的重要经历、主要业绩、个性风貌和美好心灵。即使仅写一个侧面,亦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决不弄虚作假,不贩卖隐私和低级趣味,文字朴实流畅,格调清新高雅,文中有述有评,有情有理,富于思辩性和艺术感染力。有时似乎出现闲笔,却又能紧扣主题,也给整篇文章增添了不少的情趣。

总之,我很喜欢阅读这些文章,我相信读者们也会喜欢这本书。是为序。

1996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傅 活(1)
在椿叶飘零的日子里	
——晚年茅盾琐记	陈德璋(1)
冰心和她的《相片》	杨淑心(13)
三秋树下的浩叹	
——晚年周扬二三事	陈德璋(21)
不老的夏公	陈德璋(33)
翰老三年祭	陈德璋(49)
明月·风雨·秋思	
——记女剧作家白峰溪	杨淑心(57)
三访新风霞	杨淑心(71)
吴晓邦——中国新舞蹈艺术	
的奠基者	杨淑心(81)

目 录



清荷丽影 长驻艺坛

——记著名舞蹈艺术家戴爱莲 杨淑心(95)

为了美的人类和人类的美

——吴作人及其艺术漫谈 陈德璋(121)

叶老默默归去 杨淑心(141)

冲出炼狱的男子汉——韩美林 陈德璋(145)

澹泊宁静忆思聪 杨淑心(153)

艺术之树常绿

——与贺绿汀在国外漫忆 陈德璋(163)

艺海之鸥

——记老音乐家李凌 陈德璋(181)

和才旦卓玛在一起 陈德璋(185)

跋 陈德璋 杨淑心(219)

在椿叶飘零的日子里

——晚年茅盾琐记

陈德璋



“一个生气勃勃、又严正又温情的灵魂，将永远呵护和激励中国的后来者……”

——茅盾《斯人宛在，光鲜逾昔》

秋日的斜阳，默默地跨过官厢房古旧的屋脊，投射在庭院西侧那兀然静立的椿树上，在习习的秋风中，闪动着斑驳的光彩。巴西《圣保罗之页》报首任驻京记者莫隆先生和他的法文译员已经告辞了，静静的庭院，复又沉浸在一种近乎空寂的肃穆气氛之中。

茅公的儿媳兼秘书小曼同志送客人去门口。我搀着茅公从他会客的书房外室走进里间。他刚才接受采访时，也许是由于一种近乎神奇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支撑，竟是那样

谈笑自若，神态优雅，完全不像一位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可是现在，他累了，确实累了。他艰难地走进里间，挨着床沿坐了下来，喘着气说：“不行，我得躺一躺了。”我忙扶着他轻轻地躺到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上，看看没事，才告辞了。

我通过后院东侧的甬道，来到前院，瞥见院里的老椿树那傲岸的身影，不觉又停住了脚步，在树下怆然伫立。一种甘甜如饴而又酸涩难言的情愫，蓦然从心灵的深处涌起，顷刻间充满我的胸臆。我不禁又想起了刚刚离别的他。我多么想回过头去，再次跨过通往后院的甬道，踏进他那宽敞而略嫌昏暗的书房，好好地再看他一眼，哪怕只有一眼！但是，我不能够。他已经静静地躺下了，像一片金色的叶子，飘落在大地的母亲的怀抱……

微风从椿树枝头轻轻拂过，梳理着老树那日渐稀疏的鬓发。一片黄色的叶子，忽然轻轻地从我的眼前飘下。我忙伸过手去，接住了它。细一端详，这片长椭圆状的、披针型的叶子，橙黄中还泛着三、两分土绿。它的叶托虽然枯缩了，叶脉却还含着一、二分潮润。我不禁又想起了他，想起我刚才扶他躺到床上的情景。

这是一个多么明丽清爽的秋日啊！我不愿意有一丝半缕“一叶知秋”的伤感。但是，手中托着这片普通不过的、金黄色的落叶，我却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心灵的颤动。脚下广阔的大地，哺育了多少花卉草木和人间英物，也哺育了眼前这棵平凡而粗壮的椿树。但是，在凉秋的微风中，老椿树的叶子还是枯黄了，萎缩了，飘落了，不随人愿地飘回到大地的母亲的怀抱。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坛上，他是比眼前这苍兀的

椿树高大得多的巨人。他用自己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用自己深睿的才智、勤勉的写作、淳厚的人格,特别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关于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和人物,赢得了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的景仰。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巴西记者杰拉多·莫隆先生刚才见到茅盾同志时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够拜访您这位举世知名的伟大作家,我感到非常荣幸。”他那南美洲人特有的淡棕色的宽阔的脸庞和近视镜后面的眼睛,同时放着光彩,声音竟有些发颤。

茅公谦和地笑了笑,说:“伟大谈不上。听说您也是一位作家。见到您,我也很高兴。”

是的,62岁的莫隆先生也是一位作家。他也有不平凡的经历:作为一位致力于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战士,莫隆先生坐过十八次监狱,写过二十多本书,懂葡、法、英三种语言,在数以十计的国家当过记者。七个月以前(即一九八〇年岁首),他刚到中国这个陌生的国度履新,就向外交部提出会见茅盾这个并不陌生的中国作家的要求。

去年深秋在交道口南三条胡同茅公寓所里进行的这次采访,是无拘无束的。在座的只有葡语译员老王、小曼同志和我。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从教科书上学过《春蚕》;十六岁那年暑假,又一口气读了《蚀》三部曲和《子夜》;此后,还从银幕上看过《林家铺子》,在大学的写作课上摹仿过《白杨礼赞》……但是,作为文学战线上的一名见习生,我对茅盾同志的一生确实知之甚少,一如我只端详过从大树上飘落的一片叶子,却无缘见到大树本身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根、滋荣和繁衍的进程。然而,正是这片叶子,深深地嵌进了我的心坎。

前些时候,莫隆先生向我们再次提出拜访茅公的要求时,曾经恳切地说过:“我确实很想见到他。但是我知道,他年事已高,工作很忙,所以我并不想多打扰他。只要见见面,那怕谈十几分钟或半个钟头,我也就很荣幸了。”因此,当谈话进行了四十分钟的时候,他就躬身问茅盾同志:“我们谈了这么久,是否会使您感到疲劳?”“也没有什么,还可以谈二十分钟。”还是那么谦和的笑容和答语。

这次谈话终于进行了一个钟头。我看到的,依然只是人生林海中的一片叶子。但是,这次短暂的谈话,却使我看到了这位文学巨匠数十年斗争历程的轮廓,看到他的欣慰和隐忧、风范和人格。

“茅盾这个笔名,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的?”这是莫隆先生提出的第一问题。

“大概是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茅盾同志回答,“那个时候,大革命失败了,我到武汉和董必武同志一起办《民国日报》。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很厉害,通缉很多人,我也在被通缉之列。当时我找不到出路,就用笔名写小说。”于是,产生了《蚀》,产生了《虹》,产生了轰动文坛的《子夜》……就这样,在国家、民族的逆境中,在痛苦的彷徨和追求中,他从报刊编辑和文艺评论工作和政治斗争转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用于己最为适用、于国最为有利的方式和武器,在文学道路上一往无前地前进着,与其他文艺界先驱一起,将中国现代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中。时代就是这样造就她的骄子。茅盾也不是一位为了当作家而当作家的作家。

莫隆先生对《子夜》显然十分推崇。他随身带来了一部法文版的《子夜》,郑重地请茅公签名留念,并恳切地说:“我

认为这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全貌。它可以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

“不,不”茅公立即笑着摇了摇头,表示不敢苟同,“我的书中所写的内容还是很有限的。当初本想多写一些,不但写城市,也写农村。因为当时毛泽东等同志领导的农民起义已经很活跃了。不过,后来还是没有这样写。因为我没有这个力量。我对农村不熟悉,至少是没有在部队呆过。不熟悉的东西,写起来很困难,所以没有写。当时要是把农村和革命战争的情况写上的话,就可以全面反映中国的面貌了。”

“不,”莫隆先生俨然像位判官了,“我觉得写这么多就够了。”显而易见,他也是一位艰苦备尝的作家,熟知创作的甘苦和作家的职责范围。

如果说,这两位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差异的话,那么,他们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忧虑方面却颇为一致。茅盾同志的坦诚与谦和,使莫隆先生很快变得直率了。他说:

“我对中国的当代文学知之甚少,只不过是读了你们译成外文的一些作品。然而,单是这些作品,就已经引起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忧虑了。在许多作品里,标语口号性的东西太多了,很少像你们以前那样,写有血有肉的东西。我认为,标语口号性的作品,既不是好的文学,也不是好的政治。”

茅公用右掌轻轻拍着藤椅的扶手,点头说:

“我也有类似的忧虑。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当然是这样。作家还是应该描写自然的形象,从生活中写人,通过人物的行动,表现各种各样生动的人。”

就这样,茅盾同志用浙江口音很重的话语,从容和亲切

地回答着莫隆先生提出的一个个问题,追述着他自己大革命失败前后的遭遇,二十年代末期流亡日本的经过,三十年代初期与鲁迅、瞿秋白的交往,数十年来与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触和对这两位伟人的印象,还有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和他对西方文化的印象,等等。他的话语像一阵阵清爽的秋风,简洁无华,缓慢而有节奏;他的容颜总是那样谦逊和悦,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朗旷远;他谈话的内容,却是那样丰富、深邃,就像他背后靠墙而立的一大排旧式书架一样,透过质朴的躯壳,闪射出人类智慧的灵光;他的谈锋,又是那样机敏清晰,很难使人相信他已到了垂暮之年。也许这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全部融化到文学事业上了吧?只要革命的文学事业是永存的,他的生命也就具有永不枯竭的源泉。

数千年来,人类的进步文学事业,以难以置信的生命力,肩住了一切人为的重压,冲破了各种历史的桎梏,不可阻遏地前进着,生存着,给无数作家以胜利的希望和奋斗的力量。而他,也许正是这个文学“王国”的重臣。他为她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而又从它身上得到了难以言喻的力量,去与人间蝼蚁和病患进行顽强的搏斗。近年来,他为了将更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留赠后人,为了文学新人的茁壮成长,真是殚精竭虑,拼尽余力,连常人应有的家庭生活几乎也抛到一边。随着岁月的流逝,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老人伏案劳作的背影,越来越少地看到老人赋闲时的笑容;静静的庭院,越来越少的留下老主人工余、饭后时溜腿的脚印,越来越多的飘下生命之光日渐暗淡的落叶。但是,更多的人们,却通过老人的回忆录和其他著述,看到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灿烂的篇章,看到老一辈革命家英勇战

斗的风貌和顽强跋涉的脚印……

作为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他的精力和思维能力有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茅公得知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同志英译了白居易诗三百余首，即将结集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他欣然应约为该书作序。当时，茅公年事已高，公务繁忙，我们以为他可能写的是短序。谁料时过不久，他托人送来的却是厚厚的一大摞稿子，题为《白居易及其同时代的诗人——为路易·艾黎英译〈白居易诗选〉而作》，长达八千余字。文章旁征博引，纵横开阖，畅论唐诗和白诗，见解深湛，我们读后，感叹不已。他高度评价艾黎的译作，说：“路易·艾黎同志对于中国的历史，中国大河上下、大江南北的风俗习惯，有深刻的知识和亲身的经验，这对于他选择白居易的作品是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从而保证了他的译作能把原作的精神充分地、准确地表现出来。”茅公接着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严格说来，诗歌的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拜伦的《哀希腊》，在本世纪初，苏曼殊曾以中国格律诗的形式翻译过，马君武曾以‘骚体’翻译过，但他们自己都说不很满意，我也有同感。路易·艾黎的翻译方法是不拘形似，而注力于神似……我对照着读了他的译作和原作，认为他的译作可以说是‘再创造’而又不失原作品的神韵，十分难能可贵。”茅公随稿还附来一封给中国作协有关负责同志的信，略云：“托写之序，因事作而复辍者三、四次”，“我杂事太多，实在困窘”，同时表示：“如何删削，一任尊便”。读之，既使人见其坦诚，更使人感其奋发，忧其辛劳。

艾黎老人接到茅公所作之序后，倍受感动，旋于十一月

二十四日写信经我们转茅公，表其谢忱。我受领导委托，立即将信译出，送给了茅公。记得艾黎同志在信中说：“对中国当代文学卓有影响的您，为拙作写了如此有份量和明晰的序言，确实是我莫大的荣耀，也是对我巨大的鼓舞。”

时过不久，中国作家协会在新侨饭店举行一九七九年迎春茶话会。会上，茅公和艾黎这两位史诗式的文学老人又重逢了。他们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席间，茅公满脸含笑地对艾黎同志说：“我们都八十三岁了，是同龄人。”看着他们那历尽人世沧桑的脸孔上绽开了童真的笑容，我的眼眶湿润了。在温热的眼光中，眼前的华灯皓首闪烁着更加动人的光彩，仿佛是童话世界中的圣诞老人来到人间，给一切善良的人们带来了新年的祝福，他们也在人们的心中得到永生。

然而，岁月还是悄悄的流逝了。秋风阵阵，椿叶飘零。诚然，人的精神，尤其是高尚的精神，很可能是永恒的；但是，他们的肉体，却无一幸免的受到生物进化规律的支配，无论他们是死者、生者或未来者。在斜阳苍郁的余晖中，绿叶枯黄了，飘落了，默默地、然而悲壮地飘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

法国现代文学家、政治家马尔罗曾经说过：“中国人尽管也会变老，但他们老得很慢，往往难以猜准他们的年龄。”这是事实。看看我们的茅公吧！虽然他那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髭已经花白了，但是，他那日渐稀疏的头发却永远是黝黑的，直到他静静地躺在北京医院那人生终点站的花丛中……